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20.03.017

清代中原地区传统家族的耕读 传家之道探析

魏淑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考古所,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耕读传统是中国家族社会和农耕文明的共性特征,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与核心,耕读传统悠远流长、影响深远。清代河南众多家谱、碑铭和方志显示,中原地区传统家族普遍奉行耕读传家之道,而且是一个需要数代以至十几代逐渐积累、由耕而读的渐变过程。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此一道最令人神往的光环。然而,多数家境并不宽裕甚至相当贫苦的家庭在生存压力下,子孙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道路,“耕读治家,文武储材”。伴随近世以来家族制度的终结,以及城镇化、土地流转等新的时代变迁,耕读传统如何传承变革、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将是全新的命题。

[关键词] 明清;河南;家族;耕读之道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20)03-0114-06

家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而普遍性的存在,家族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传统家族社会,农为邦本,士为四民之首,耕读是农耕文明的基本基因。在宗法制的传统乡村中,亦耕亦读是根深蒂固的日常状态,是一以贯之的传家之道,以“耕”养生保家,以“读”修齐治平,实现了城与乡、家与国的良性互动,正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隋唐确立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入仕逐渐成为阶层上升最为重要的途径,“耕读传家”愈发成为小康农家努力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书香门第被视为家族兴旺最可靠的凭借。^{[1][4][2][5][6]}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与核心,耕读传统悠远流长,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河南众多家谱、碑铭和方志显示更是普遍奉行耕读传家之道,而且是一个需要数代以

至十几代逐渐积累、由耕而读的渐变过程。

一、“家无读书子,不可以为家”

清代雍正朝密县(今郑州新密市)洪山庙张氏先茔碑详细叙述了本族由耕而读、后世多有功名并出任官职的历程:

念始祖本洪洞人也,因迁民而至东洪山处,他无所营,以农为业……传至二世、三世,咸推为乡饮耆宾焉;迟延四世、五世,家业颇冒,习知义礼焉。迨历六世、七世,而入文庠者有二人焉;至八世、九世入文庠者二,入武庠者二,共四人焉;及今有堂兄由廩贡而训导于正阳焉。旗祖典口蓝山族侄,又以经历而待铨选焉。堂弟又入文庠,堂侄登园桥焉。至于父,闾邑绅士公举贤良方正,奉旨恩赐正八品爵,职荣身焉……凡值追荐之期,相与拜奠于墓下,既奠,尊卑长幼名叙列

[收稿日期]2020-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6BLS006)

[作者简介]魏淑民(1977-),女,河南濮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清史,区域史。

坐次,其长者顾少者而告之曰:“凡在此,丧葬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苦则老者扶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其教子孙也,以耕读其持家道也,以勤俭待族人,笃亲爱之情,处乡里敦和睦之道,存心务要忍耐,行事亦须公平,不然者,吾族人之所共责也。^{[3]册1,262-263}

由此可见,耕读传家演进的基本路线图:先是谋生所迫纯粹务农,没有供给本人和子孙专心业儒应考的条件。经过几代积累家境略为小康,逐渐习知义礼,具备培养专心读书人才之基础,正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而后家境继续殷实,入学读书子孙基数不断增加,各代陆续有少数中式以至出任官职者,光耀门楣,不仅扬名乡里,又可为后辈子侄读书、中式、出仕提供更好的环境,推动家族不断壮大兴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要义在于在传统农耕社会中读书是取得功名、光宗耀祖的康庄大道。所以,张氏碑莹最后复行强调,祭祀祖先时一再教谕子孙,务必以耕读为持家之道。

与此相反,同样出自清代密县的道光朝《创建松浯公祠堂碑记》则指出,百年来家族式微的原因就在于谋生者多而读书人少,如其所言:

我黄氏由后汉中叶,历魏、晋、五代,而唐、宋,而元、明,自文强公,至松浯公。虽经累代流离播迁,而诗书簪纓,蝉联不绝,可不谓盛欤。夫何自松浯公而降,延及国朝,列仕籍者,仅学博四人而已。呜呼,我黄氏亦稍陵夷衰微矣!然独有人也。近百年来,族众率多贫困,以奔走衣食为务。不惟登科第者无人,即读书识字,名隶胶庠者,亦复寥寥无几。呜呼,我黄氏之陵夷衰微为已极矣。兹者既建松浯公祠堂于此,尚望登斯堂者,抚今追昔,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凛凛乎如松浯公临之在上,督责而鞭扑之也,以继书香,以系世德。^{[3]册1,328}

故而该族在建立祠堂之际,念念不忘告诫族人父子兄弟严加课读,以告先祖并复兴家族荣光。

汜水县《清授登仕郎王坤元先生墓碑》则讲述了先祖多有功名、中衰复兴后又特别重视子孙

课读的故事,“始祖天寿,自晋之洪洞迁汜虎牢关。二世让,三世庠生政,四世廩膳生璐,五世太学生全,六世聪,七世太学生彦章,八世鼎,九世庠生国卿,十世庠生俭,十一世增广生元起,十二世价。累世有清德。及祖河,家中落。先生父忠信公,往来梁垣,为谋生计。先生十四岁,游大梁,基父旧业,经营数十年,始克复前人恒产。输粟,授从九品职衔。命长子化纯、次子化普,入学习举子业。化纯屡试童子军,在梁垣彝山书院肄业,试辄冠其曹”^①。

以上,正反事例一再说明了耕读传家的正统性。正如现存三门峡卢氏的《原任山东馆陶知县济川王公墓志铭》一再告诫子弟所言:“人不知书,不可以为人。家无读书子,不可以为家。”^②亦如清末廉吏广东、广西巡抚马丕瑶故居——马氏庄园(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楹联反复强调,“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处事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

二、封赠父祖,光耀门楣

如果说耕读传家是传统家族社会的持家之道,那么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则是此一道路最令人神往的光环,尤其封赠父祖是回报本木水源之恩的不二选择。封赠是中国古代皇帝给予官僚及其家室、祖先以官爵或名号的荣典。汉魏以来历有废设沿革,至明清发展到顶峰。

清朝品官凡十八等,各有相应之阶称,命妇亦依九品而各有称号。职官若遇覃恩诏旨,可依阶称和命妇之号得受封典。封典依品级不同而有诰授、敕授之分,有封赠代数之别。在清朝封赠制度中允许地封,即官员将自己应受之封号呈请移至父祖等前代,移至存者曰“封”,移至歿者曰“赠”,并规定“凡地封,不逾制”。若八品、九品官本应止封本身,若地封则止许封至父母;四、五、六、七品官本应封赠一代,若地封则止许封至祖父母,依此类推。(见下页表1)封赠(包括地封)作为文武官员的一项重要权利,迎合并满足了他们光宗耀祖的传统心理要求,反映了宗法思想对职官制度的影响。^{[4]140-142}

① (民国)《汜水县志》卷十一,《艺文志》。

② 参见(光绪)《卢氏县志》卷十六,《艺文志》。

表1 清代文武官员封赠级别一览表

品级	文官阶称	武职阶称	命妇称号
正一品	光禄大夫	建威将军	一品夫人
从一品	荣禄大夫	振威将军	
正二品	资政大夫	武显将军	夫人
从二品	通奉大夫	武功将军	
正三品	通议大夫	武义都尉	淑人
从三品	中议大夫	武翼都尉	
正四品	中宪大夫	昭武都尉	恭人
从四品	朝议大夫	宣武都尉	
正五品	奉政大夫	武德骑尉	宜人
从五品	奉直大夫	武德佐骑尉	
正六品	承德郎	武略骑尉	安人
从六品	儒林郎 (吏员出身者宣德郎)	武略佐骑尉	
正七品	文林郎 (吏员出身者宣议郎)	武信骑尉	孺人
从七品	徵仕郎	武信佐骑尉	
正八品	修职郎	奋武校尉	八品孺人
从八品	修职佐郎	奋武佐校尉	
正九品	登仕郎	修武校尉	九品孺人
从九品	登仕佐郎	修武佐校尉	

(资料来源 艾永明著:《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1页。胡绍华主编:《档案馆工作研究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2页)

封赠父祖,光耀门楣,有不同品级和层次之分。最理想者,莫如本人读书进学、高中进士,宦海沉浮、官居一品,她赠父祖、封妻荫子。清代河南仪封籍(今开封市兰考县)高官张伯行即是典型例证。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至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清世宗元年(1723)迁礼部尚书,特恩晋一品,追赠三代,并赐匾“礼乐名臣”。其曾祖父、祖父、父三代皆累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曾祖母、祖母、母三代及妻室俱赠一品夫人,次子张师载以举人身份荫补员外郎。正如朱轼、张廷玉等名臣在其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言:

其先出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彦实徙仪封,因

家焉。曾祖讳自新,廩膳生,累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曾祖妣戴氏、扈氏,累赠一品夫人。祖讳醇,邑庠生,有隐德,有司表其闾,累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祖妣傅氏,累赠一品夫人。考讳岩,以太学生考授州司马,好义乐施,乡党称之,封征仕郎、中书科中书舍人,累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祀于乡。妣郭氏、梁氏,累赠一品夫人。继母耿氏,未封。梁太夫人实生公也……配王氏,累封一品夫人。次王氏,赠宜人,实生二子:长师轼,候选知州;次师载,丁酉科举人,一品荫生候补员外郎。^{[3] 册 2.396-398}

对于普通耕读之家,更多士子是久困场屋、屡试不中,即使进士中式多年沉浮,也多是州县

小官,但毕竟取得了封赠父祖的资格。另外,也有一些家境殷实的士子通过捐纳途径取得某些低品级文武官职衔,虽然级别较低,同样进入了封赠父祖的行列,并且随着有清一代捐纳制度的放开而逐渐走向泛滥。

清代南阳府裕州(今方城县)进士出身的王澐取得河南按察司经历(正七品)头衔后,获得封赠父祖的资格,祖父、父封文林郎,祖母、母封孺人,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9)专门立碑以彰荣宠,并且其封赠敕文颇有代表性,属于封赠父祖的一般格式和措辞: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考绩报循良之最,用奖臣劳;推恩溯积累之造,以彰祖泽。尔王作霖,乃按察司经历衔进士王澐之祖父。锡光有庆,树德务滋。嗣清白之芳声,泽留后世;衍弓裘之令绪,祐笃肯堂。兹以尔孙,遵例急公,贻赠尔为文林郎,锡之敕命。于戏! 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励新猷;有谷贻孙,发蒙养而丕彰潜德。

制曰:册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绩;德门积庆,式昭大母之芳徽。尔尹氏,乃按察司经历衔进士王澐之祖母。箴诚扬芬,瑜璜表德;职勤内助,宜家久著。其贤声泽裕后昆,锡类式承乎嘉命。兹以尔孙,遵例急公,贻赠尔为孺人。于戏! 播徽音于彤管,闾范弥光;膺异数于紫泥,宠床允劭。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资父事君,臣子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宏锡类之恩。尔廩生王道南,乃按察司经历衔进士王澐之父。善积于身,祥开厥后。敦子著义方之训,传家裕堂构之遗。兹以尔子,遵例急公,赠尔为文林郎,锡之敕命。于戏! 殊荣必逮于所亲,宠命用光夫有子。钦兹优渥,长莩忠勤。

制曰:奉职在公,嘉教劳之有自;推恩将母,宜锡典之攸隆。尔卢、姚、张氏,乃按察司经历衔进士王澐之母。闾范宜家,夙协承筐之徽;母仪贻谷,载昭画荻之芳。兹以尔子,遵例急公,赠尔

为孺人。于戏! 著淑德于不瑕,式荣象服;膺宠命之有赫,允贲泉垆。^{[3]册7.382}

清制,按察司经历系正七品文官,故祖父、父封文林郎,祖母、母封孺人封号。文林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置,为从九品上散官。炀帝大业三年(607)罢,又于秘书省另置为职官,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从八品。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复置为文散官,从九品上。宋初因之。神宗元丰三年(1080)废。徽宗崇宁二年(1103)复置为选人阶官,取代旧官留守、节度、观察推官及军事判官,从八品。金、元为第三十五阶文散官,金正八品上,元正七品。明清沿置,以授正七品文官。^{[5]233}孺人,外命妇封号。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定,用以封赠通直郎以上至承议郎之妻。元命妇中无此封号。明用以封赠七品、清用以封赠七至九品官之妻,武职八旗八品以下、绿旗营七品以下妻无封,后改绿旗营正七品妻亦封孺人。

嘉庆年间,河南怀庆府博爱县著名的寨卜昌王氏十六世王绍业则因为捐职布政司理问(从六品),先祖封赠级别晋升为儒林郎和安人。^①有意思的是,后来因为王绍业之孙王启泰捐官从五品武职守御所千总,道光年间王绍业本人被敕封武德佐骑尉。因为是武职封赠,其措辞之文官略有不同,但格式仍大体相同。迨至光绪年间,王绍业又因曾孙王大温指分山东试用道加三级的身份,被敕赠通奉大夫,其妻敕赠为夫人。^{[3]册4.80}河南怀庆府寨卜昌村南为沁河平原,北近太行山脉。相传周武王伐纣时途经此地,占卜得曰“昌”,故得其名。寨卜昌村的王氏家族于明清之际逐渐成为地方大族,创有怀庆著名商号“泰顺号”,远近闻名。泰顺号靠贩卖铁锅一步步累积财富,至同光年间岁已然入百万两。值得注意的是,自泰顺号创立开始,王氏家族中“有身份”的成员逐渐增多。汇总《王氏宗谱》以及碑铭所得,该时期身有功名者有11人,父祖所受之“敕赠”多因本人或子孙“遵例急公”“克襄王事”,所授多

① 王兴亚等:《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4册第48页,(博爱)御敕王仪文。儒林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置,为文散官,正九品上。炀帝大业三年(607)罢。改于秘书省置,员十人,正七品,掌明经待问,唯诏所使。唐朝置为正九品上文散官。北宋前期置,神宗元丰三年(1080)废。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置为选人新阶官,从八品,取代旧阶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金朝置,以授从七品下文官。元朝改从六品,敕授。明朝为从六品之升授。清朝为从六品,封赠。参见张政烺著:《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页。

为虚衔,并无实职。通观寨卜昌王氏家族连绵不断的封赠敕文,不但光宗耀祖,对怀庆地方社会而言也提供了一条经济资产向政治资本转化的新途径,该家族向怀庆地方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也逐渐增强。^{[6]115}

三、生存压力下的多元化选择

传统家族社会,在耕读传家的社会大传统下,子孙能读书中式、封赠父祖或封妻荫子当然是每个小家庭、大家族梦寐以求的无上荣光。然而,诚如上文所言,仓廩实方能知礼义,一众子孙读书进学是需要解决温饱基础上坚持十几年甚或几十年,旷日持久且相当耗费银钱之事,并非每个家庭所能长期承受。因此,多数家境并不宽裕,甚至相当贫苦的家庭在生存压力下,子孙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道路:或者本人体恤家境窘困、父母艰辛而主动弃学而务农持家、习武从军、经商贸易、充当衙役,或者家长根据子孙不同的资质和秉性因材施教,子孙或文或武或商。这样,首先解决大家庭谋生温饱之要务,在此基础上相互调剂配合,或许又能发挥振兴家业的作用,正所谓“耕读治家、文武储材”,这样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一揽子交易”分散风险的原理。

晚清怀庆府博爱县魏守贞家族堪称各因其材培养子弟的典型例证。其倡导“顺其天资而善栽培之,必成有用之器”“子弟多者,使各执一业,以互相调剂则家必兴”。实践中,三个儿子分别走上了读书、经商、务农的不同人生道路,“长长发,业农;次长安,简易师范学堂毕业生;季长龄,业商”。因此,其墓志铭有这样的评价,“是君栽培子弟以起家业,询足为后世模范”^{[3]册4,101}。南阳唐河李方城一家五子,亦是或治家,或士或农,或商或贾,是以子孙昌隆盛炽,家道殷实和平。^{[3]册7,359}

晚清光绪朝巩县翟家的子孙多元化发展模式则明确延续到了第三代。在家境逐渐宽裕可以为诸子延师课读的情况下,仍坚持因材施教,

各精其业、各展其长,“长子凤仪、四子凤翥,郡试均列前茅。次子凤翔力于农事,深知稼穡艰难”。其本人则留心武备,拳勇可敌数十人,并且引导三子凤苞习学武术,父子在咸丰、同治朝曾抵御流寇,远近称颂。这种多元模式在孙辈中也有明显体现,“长孙云亭素刀学,名噪艺林;次孙德润,武庠生,精于弓马;其余或横经或负耒,类皆循规蹈矩,不失公之家法”^①。

光绪宣统之际,陕州(今三门峡陕县)刘万善家族则更进一步,分设文武两馆教育子弟。刘万善本人命运多舛,十三岁父亲早逝,弟弟更是年幼,孀母独自拉扯兄弟成人。待到壮年家境好转后,专门分设文武两馆培养子弟。在六个儿子中,“次与六,应文试;长与三、四、五,应武试”。从日后诸子的人生境遇看,这种多元化的分布确实显示了分散风险、相互调剂的优势,“次滞于小试,中年不禄。六、长应考,蒙新政,免试宏开学堂。俟入,长家冗不遑,报捐从九品。四弓马娴习,屡试未捷,中年不禄。三与五,俱入庠”。刘家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耕读治家、文武储材”的道理。^{[3]册3,349}

乾隆朝渑池县赵乙祥则是因家贫而弃学,先是充当衙役,期满后经营煤窑,“幼业儒,贫未能业,嗣充县户掾”。他经营煤窑三十多年,其间颇多波折,最后挣得家业,“田及八顷,房修数图”^{[3]册3,485}。其漫漫人生经历,再次证明谋生是人生不容选择的第一要务。

在清代乾隆朝至道光朝河南开封府直隶郑州地方,荆秉方作为长子因家贫而辍学走上学徒、经商之路,养家糊口、孝敬父母之余,条件逐渐宽裕,帮助两个兄弟成家养育子女,并且还帮助二弟捐纳从九品官衔,帮助三弟援例入监。其经历说明长子在养家糊口、维系家族方面肩负更大的责任和压力。^②

密县《皇清特授虞城汛分府以守府用晋昭武都尉贞夫蔡公墓志铭》显示,由于家中变故难以

① (巩县)皇清例授登仕郎翼周翟公墓表,碑存今巩义市西村镇罗口村(孙宪周勘)。

② 王兴亚等:《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1册第51页,(郑州)《皇清例授武略骑尉隅庵荆公(秉方)暨德配尹安人合祔墓志铭》。长子虽多有养家的责任,然而情况不尽然如此。三门峡陕县张紫衢虽系家中长子,却是无须操心的有福之人,“少之时,父在为子;中年,手足可藉;及其老也,儿女尤能养志。故公得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我镇人皆称公为福享第一也”。一生虽专意读书,却未有任何功名,故其碑铭称之“公性浑噩,唯书是读”。出自《皇清教授登仕郎小东张公(紫衢)墓志铭》,参见王兴亚等:《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3册第341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糊口,无奈走上习武从军之路,最后成为武职正六品千总。“父与长兄相继而亡,家业淡泊,寸土俱无,困苦艰难,公备尝之。后愈困愈艰,无奈,舍诗书,谋生涯,以糊其口。是年至弱冠,公奋志习武,以府元入庠”。由于处世精明,上司颇多倚重。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外委把总(武职正七品)使用。道光三十年(1850),赴署广西行营投效。咸丰五年(1855),官居归德营虞城汛千总(武职正六品)。^{[3]册1,351}

光绪朝南阳新野县乡耆方永书则是因家贫辍学充当木工,虽然不能与千总官职相提并论,却因手艺精湛,广收学徒,众徒弟们凭借所学手艺也多能自谋生计。徒弟们受其恩泽,在师傅古稀之年公立德寿碑,“以志其德教,并纪其德寿”。参与立碑者包括门徒于文、吴永光、杨兴顺、于全、刘振荣、张临旭、白炳军、贾喜龙、张平顺、郭成禄、屈安、常有德等十二人,并且碑文开篇对其手艺多加称誉,“古之人多才多艺者尚矣,其化则一才一艺,苟能业精于勤,亦足以训当时而传后世”,其间虽不乏徒弟对授业师父的感恩溢美之词,也从侧面证明读书之外以手艺立身成己成人之德。^{[3]册7,306}

四、余论

以上,“家无读书子,不可以为家”的基本理念,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光环效应,以及生存压力下的多元化选择,不仅适用于清代河南,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也是中国古代耕读传统的

基本要素。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社会和农耕文明的共性特征,耕读传统长期存在并影响深远。伴随近世以来科举制度的终结、小农经济的解体以及家族制度的消亡,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迁,耕读传统亦随之飘摇,有些因子依然存续,有些随之消失,有些经过改造产生新质。当下,城镇化浪潮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祖辈固守的土地进城打工,传统的村落不同程度表现出“空心化”。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进程中,历经数千年演化并具有某种“自在化机制”的耕读传统,如何在传承与变革的双重变奏下发展将是新的命题。

[参考文献]

- [1]徐雁.“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从“耕读传家”“书香门第”到“藏书世家”[J].图书情报研究,2019(2):14-22.
- [2]彭兆荣.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耕读传家”的家园遗产[J].贵州社会科学,2019(5):56-61.
- [3]王兴亚.清代河南碑刻资料[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4]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张政娘.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6]吴逸飞.明清时期家族兴衰与地方社会的整合:以寨卜昌村王氏家族为典型个案[J].中国文化研究,2008(4):105-118.

[责任编辑 孙守朋]

On the Farming-reading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ies in Central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WEI Shum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farming and reading is a common feature of Chinese family society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Central Plains represented by Henan Province is the origin and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tradition of farming and read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Many genealogies, inscriptions and local records of Hen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famil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followed this tradition generally, and it was a gradual process that required generations or even decades of gradual accumulation. The most fascinating glory of this road lies in the glory of their ancestors, wives and children. Howev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 most of the families who were not well-off or even quite poor shows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 With the end of the family system, modern urbanization, land circulation and other new changes of the times, how to inherit and reform the tradition and how to play a new rol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ill be a new proposit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nan; family; farming-reading tradition